

第一講 導論：兼論傳統中國史學的思想基礎

壹、講授內容摘要：

1.引言：

本課程是「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」，在進入本課程的第一週，我們先從廣泛的歷史視野出發，提供有關歷史思考的相關背景。近二百年來，西方哲學界與思想界可以說經歷過三個轉向：第一、從對形而上的關懷，轉為對知識的可能性以及知識之性質的關懷，可謂「知識論的轉向」(epistemological turn)；第二、二十世紀初期以降，西方哲學界（至少在英美哲學界）對語言之結構、語言與世界的關係以及意義的分析等議題的關懷，可謂「語言的轉向」(linguistic turn)；第三、近年來，關於知識的基礎以及認知主體等議題重獲注意，科學哲學與詮釋學的新發展逐漸展開了一種「解釋的轉向」(interpretive turn)，其影響並波及文學批評、文化人類學、史學、女性主義理論、後殖民論述等領域，為人文學研究開啓了諸多新的視野。

為了將本課程所討論的「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」，置於一個較為具體的情境中進行思考，我們必須從史學史脈絡論「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」。本講將扣緊下列問題，進行分析：

2 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

- (一) 中國史學的思想基礎何在？
- (二) 這種思想基礎使中國史學表現何種特徵？
- (三) 中國傳統史學中的思考方法有何特質？潛藏何種問題？

2.傳統中國史學的思想基礎：

2：1 精神基礎：人文主義

中國史學堅強的精神基礎即是人文主義，然而人文主義在中國文化脈絡之中，有著與西方不同的發展。中國古典文明誠如人類學家張光直（1931-2001）所說，是一個連續性的文明，在經過雅斯培（Karl Jaspers，1883-1969）所說的「哲學的突破」以後，所改變的是人與人的關係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；人與自然、超自然之間的關係並沒有遭到破壞，因此得以被延續下來。從《詩經》〈烝民〉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天監有周，昭假於下，保茲天子，生仲山甫」的敘述裏，¹可看出中國傳統認為人稟承天之意志而生，強調「己心與天心互通」的緊密聯繫；中國人文精神，是眾民悠游於天地之間的情懷，對超自然天命充滿了無限的嚮往崇拜。以這種人文精神作為根本的傳統中國歷史學，較少強調具有反抗色彩的英雄

¹ 《毛詩正義》，（臺北：文化圖書公司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，1972年），卷十八-三，〈烝民〉，頁569。

人物，對社會上被壓迫的弱者則投以高度的關懷，例如《史記》七十〈列傳〉首篇記載的即是伯夷、叔齊這樣在社會上沒沒無聞的人物，而三十〈世家〉將讓位於季歷的吳太伯置於最前，也體現了相同的價值取向。

古代西方世界通過了技術改革或商貿活動而帶動的突破，從而產生出一種所謂「斷裂性的文明」，其間人與自然、超自然的關係互相抗衡。也因此，西方人文主義迥異於中國傳統所講求的天人和諧，特別強調人從上帝賜與的既定命運裏掙脫，走出真正屬於自己的道路。這種思維使歷史學家格外重視對英雄的表彰，由羅馬著名詩人希塞羅（Cicero, 106-43 B.C.）對「人文」一詞的解釋，以及索弗克里斯（Sophocles, C. 496-406 B.C.）撰著之《伊底帕斯王的悲劇》（*The King Oedipus*）內，都可看出西方文明對於抗拒天命的勇者，一直抱持著相當濃厚的興趣。

2：2 精神之表現：（一）重人甚於重事

中國史家認為人是締造各種事件的關鍵，因此長久以來即致力於對人物的刻劃，特別重視〈太史公自敘〉裏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」的著史原則。例如《史記》中最精彩的為七十列傳，雖另有〈書〉、〈表〉進行補助性的說明，但主要內容仍在涵納個人的表現。西方史家則側重在描述（describe）整個歷史事件，譬如「史學之父」希羅多德（Herodotus, 484-429 B.C.）繪敘波希戰爭史（*Persian War*, 490-480 B.C.）的過程，就將這場戰爭置放在東西利益衝突

4 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

的脈絡裏來考慮，又譬如波里比亞斯（Polybius, 203? -c. 120B.C.）《史記》（*The Histories*）陳述羅馬怎麼由城邦擴充為世界性的大帝國、如何將愛琴海變成內湖等，這種重視前後因果的線性書寫方式，便與中國史著有極為強烈的對比。

2：3 精神之表現：（二）肯定歷史行為者的自由意志

中國史家解釋歷史的因果關係，多著重於人物之心術，認為事件的發生主要決定在歷史行為者的存心與意志；這項特點正與前述特點相互扣合。最顯著的例子就是《左傳》〈宣公二年〉的記載：²

趙穿攻靈公於桃園，太史書曰：「趙盾殺其君。」以示於朝。宣子曰：「不然。」對曰：「子為正卿，亡不越竟，反不討賊，非子而誰？」宣子曰：「嗚呼！我之懷矣，自詒伊戚。其我之謂矣！」孔子曰：「董狐古之良史也，書法不隱。」

若以現代觀點視之，以上所引的這一段董狐的記述與孔子的批評應該屬於一種價值判斷（value judgement）而非事實判斷（factual judgement）；他們認為趙盾沒有討伐弑君的兇手，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意志，是故必須對此一事件負

² 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（高雄：復文書局，1990年），宣公二年，頁662、663。

起最後的責任。西方史學作品中對歷史的解釋亦不同於中國傳統史學，例如希羅多德認為波希戰爭之所以不可避免，實源自希臘民主政治與波斯專制政治間的不相容；修昔的底斯（Thucydides，c.460-c.400 B.C.）析判斯巴達與雅典戰爭的起因，則歸諸雙方貿易經濟利益的衝突等，西方史學大抵就事論事，其間多不涉及道德評斷。因此，錢穆（賓四，1895-1990）於《史學導言》裏，曾說中國史學出入於「世運興衰」、「人物賢奸」八字，³其中「世運興衰」又必須在「人物賢奸」的脈絡下思考，明顯地表現出中國史家對歷史行為者之自由意志的重視。

2：4 精神之表現：（三）史學以經世為目的

傳統史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淑世乃至於救世，因此時代變亂愈大、憂患愈多，史學往往愈發達，例如明清之際，在顧炎武所謂「天崩地解」的時代動盪裏，史學格外興盛；相反地，史學精神的衰落通常也就是時代精神衰落的指標。從《史記》〈太史公自序〉引上大夫壺遂之問以及引述董仲舒（約 179-104 B.C.）對孔子作《春秋》用心的一段話，司馬光（1019-1086）《資治通鑑》〈進書表〉說：「〔《資治通鑑》〕專取關國家盛衰，繫生民休戚，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，為編年一書」等等，⁴皆表現出傳統史學的經世傾向。

³ 錢穆：《史學導言》（臺北：中央日報社，1970年），頁32、33。

⁴ 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（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5年），〈進書表〉，頁9607。

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》中更明確指出：「史學所以經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」，認為整輯排比文獻不足以稱為史學；真正的史學必須切合人事。也因此，中國史學向來有著史論的傳統，從《左傳》之「君子曰」、《史記》之「太史公曰」、《漢書》之「論贊」、《三國志》之「評」，一直到《資治通鑑》的「臣光曰」，皆顯現出歷史學家獨立於權力外、化身為社會良心的強烈使命感；對照於希羅多德曾以朗讀初稿獲得賞金，展現出某種享樂精神的歷史觀，中國史家有著較嚴肅的著述態度。

2：5 精神之表現：（四）史家自視為歷史真理的守護者，並特重道德判斷

中國歷代史官，在原則上都能保持直書的傳統，秉筆維護他們心目中的道德與正義。例如《左傳》記載襄公二十五年，太史書曰：「崔杼弑其君」，崔子殺之，其弟嗣書，而死者二人，其弟又書，終使崔杼不得不放棄竄史的念頭。而唐代天子如欲觀起居注，通常會遭到史官嚴峻拒絕，正是為了保障直書傳統，於無形中制定的不成文規定。由於中國史家以經世為目的，自視為真理的守護者，因而發展了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合而為一的著史傳統，特重褒貶，所以劉勰（彥合，約公元 465-？）《文心雕龍》說：「褒見一字，貴踰軒冕；貶在片言，誅深斧鉞」。⁵

⁵ 《文心雕龍注》（臺北：開明書局，1968年），卷四，〈史傳〉，頁1。

3.傳統中國的史學方法：依據劉知幾（子玄，661-721）《史通》裏的說法，中國史學從寫作方法這個層面而言，可分為所謂「六家」與「二體」：

3：1 六家：劉知幾說：

古往今來，質文遞變。諸史之作，不恆厥體。權而為論，其流有六：一曰尚書家，二曰春秋家，三曰左傳家，四曰國語家，五曰史記家，六曰漢書家。⁶

所謂「尚書家」意指記言體，「春秋家」意指記事體，「左傳家」為編年體，「國語家」則為國別體，「史記家」代表通古紀傳體，而「漢書家」則代表斷代紀傳體。

3：2 二體：就是以載述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，與以敘事為中心的編年體。前者「紀以包舉大端，傳以委曲細事，表以譜列年爵，志以總括遺漏」，⁷擁有鉅細靡遺的優點；後者「繫日月而為次，列時歲以相續」，⁸可以清楚地顯示出人事於時間中的流變。

4. 傳統中國史學理論的預設及其問題：

4：1 預設：

中國傳統史學的方法論背後，隱伏著「垂變以顯常，述事

⁶ 劉知幾：《史通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93年），卷一，〈六家〉，頁1。

⁷ 同上書，卷二，〈二體〉，頁27、28。

⁸ 同上書，頁28。

8 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

以求理」這樣的基本預設。傳統中國史家認為歷史之內蘊藏著永恆的常道，歷史敘述正爲了提煉這些常道而存在。例如太史公藉由伯夷與叔齊的史實對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」價值信仰的否定，來反省他對人生問題的困惑，並希冀透過對這個特殊的個案的分析，而對永恆的價值問題求得一個普遍的解決。這種預設顯示出，中國史家眼中的真理是靜態而非動態的，它們落實於人事之中、寄託在特殊事件裏，等待歷史學家去理解剖析。

4：2 問題：

中國史學方法論的這種預設，使歷史被當作是提煉「永恆之真理」的一種手段，造成傳統史學變遷意識不發達，在宋代以後這種傾向尤爲明顯。

5.宋代儒家思想與史學的發展：

5：1 「近世中國」的來臨

「紛紛五代亂離間，一旦雲開復見天」，經過唐末五代的巨大動亂，中國於公元 960 年宋朝建立後，開展了一種新氣象。日本京都學派前輩學者內藤湖南（虎次郎，1866-1934），就認為宋代是中國中世社會的結束，也是近世社會的開始，他舉出八項變化說明唐末五代所出現的近世性的指標：⁹

⁹ 參考：內藤湖南：〈概括的唐宋時代觀〉，《歷史と地理》，第9卷第5號（1922

- 一、貴族政治的衰廢，君主獨裁的代興。
- 二、君位的變化。
- 三、君主權力的確立。
- 四、人民地位的變化。
- 五、官吏任用法的變化。
- 六、朋黨性質的變化。
- 七、經濟上的變化。
- 八、文化性質的變化。

5：2 相應於以上變化，儒家思想出現新局面：

(一) 退《五經》進《四書》：《五經》代表中世貴族社會的學問，其目的在促進帝國政權的推動；《四書》則不為特定階層服務，其目的在幫助個人修身。這個改變象徵了個人從此取得獨立自主的價值，不再是帝國的工具。

(二)「理」之概念的發達

5：3 宋代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，宋人自覺與過去不同，是故宋人的歷史意識更加發達（或許這可與西方文藝復興時代，人文主義大師佩脫拉克自稱其時代為「近代」，稱先前為「黑暗時代」的心理相比擬），而先前所言的中國史學方法論問題也特別明顯。

年 5 月)，此文有中譯本，收入：劉俊文編，黃約瑟譯：《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（第一卷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 年），頁 10-18。

6. 宋人歷史敘述的幾個面向：¹⁰

6：1 中國儒家學者解釋歷史常常以「三代」（夏、商、周）作為黃金時代，他們常以回歸「三代」盛世作為批導現世並指引未來的有力武器。

6：2 宋儒以堯、舜這種「典範人物」為中心來進行歷史論述，但是，歷史敘述常常只是他們進行哲學思考，建構普遍理則的工具。他們喚醒或重現（reenact）典範人物的事蹟與經驗之目的，在於論證典範人物行為中呈現的規範有其普遍必然性。

7. 宋儒的歷史敘述中潛藏的思想內涵：

7：1 宋儒進行歷史論述時所呈現的第一項思想命題是：普遍的「理」可以見之於特殊的「事」裏，特別是在古代聖人的行誼之中。

7：2 然而從上述歷史預設，可導出以下根本的質疑：既然讀史是為求「理」，而且「理」皆載於經之中，那麼，直接讀經就可以了，何必讀史？讀「史」之理由何在？中國傳統史學一切的研究只是為了求理，隱藏著一個自我否定的命題：

¹⁰ 第 6 及第 7 節各項論點之詳細分析，參考：黃俊傑：〈儒家歷史敘述的特質：宋儒集體記憶中的聖王典範〉，收入：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主編：《史學與文獻》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98 年），頁 1-26；Chun-Chieh Huang, "The Philosophical Argumentation by Historical Narration in Sung China: The Case of Chu Hsi," 《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》，第 51 期（1999 年 12 月），頁 55-78。

- (a) 流行於宇宙之間的「理」，具足於吾人「心」中。
- (b) 古聖先賢相傳之言，使我們瞭解：「理」只有在聖人身上才能具體化。
- (c) 一切個人之榮枯、國家之興亡乃至宇宙之存廢，皆有賴於聖賢相傳之「理」，具體落實於每個人的行止之中。因此我們不能離開聖人而覓理。

7：3 「理」既是事實又是價值、是規律又是規範的觀點，使中國傳統史學產生幾個根本的問題：

- (a) 如何解釋歷史政治黑暗或文化混濁的時代亦在「理」的支配下運行？
- (b) 在具體而特殊的歷史脈絡裏，「理」、「事」往往不是重疊關係，甚至是種悖逆關係；當「理」被運用於各種不同立場時，經常會產生自我抵牾，「理」的實踐是否有其內在矛盾性？
- (c) 在這個連「體系」、「真實」等事物的存在都無法確認的後現代社會裏，人們對於「理」的認知是相對而非絕對的，那麼史學家如何肯定自己提攝出的「理」具有價值？
- (d) 「理」是一元亦或是多元的？若是多元的，那麼彼此之間是否相容？

8. 結論：

宋儒所賴以提出哲學命題的歷史敘述，本質上近於余森（Jorn Rüsen）所謂「例證式敘述」（exemplary narrative）。¹¹這種「例證式敘述」異於傳統式（traditional）、演化式（evolutionary）或批判式（critical）的敘述方式之處在：例證式歷史敘述中的「時間」，將自然的時間轉化為一種人文的時間，其特徵是從具體之歷史事實或個案中抽離出普遍而抽象的行為規則，並申論行為規則的普遍必然性。我們可以說，在儒家傳統裏，「普遍性」深深地根植於「特殊性」之中，而「抽象性」也建立於「具體性」之上。然而普遍性與特殊性、抽象性與具體性之間卻有內在矛盾性，此矛盾性如何解決，是中國歷史理論值得思考的問題。

貳、閱讀作業：

- 1.《史記》〈太史公自序〉，建議背誦其中自「上大夫壺遂曰……」至「述往事、思來者」一段文字。
- 2.朱熹：〈讀書之要〉，《朱文公文集》（四部叢刊初編縮本）卷七十四，頁一三七一。
- 3.嚴耕望：《治史經驗談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1年）。
- 4.嚴耕望：《治史答問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）。
- 5.黃進興：〈論方法及方法論：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〉，《食

¹¹ Jorn Rusen, "Historical Narration: Foundation, Types, Reason," *History and Theory*, XXVI:4 (1987), pp 87-98.

貨月刊》，復刊 11 卷 5 期，1981 年 8 月，收入：康樂，黃進興編：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》（台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81 年）。

6. 李弘祺：〈學習歷史應該研讀史學名著〉，收入：李弘祺編譯：《西洋史學名著選》（台北：時報出版公司，1982 年）〈附錄〉。
7. 黃俊傑：〈戰後台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 1950~1980〉，收入：黃俊傑：《戰後台灣的教育與思想》（台北：東大圖書館，1993 年），頁 29-100。
8. 司馬遷：〈報任安書〉。
9. 《史記》，〈伯夷列傳〉。
10. 《史記》，卷十三，〈三代世表〉序。
11. 《史記》，卷一，〈五帝本紀〉贊。
12. 《史記》，卷一二三，〈大宛列傳〉贊。
13. 劉勰：《文心雕龍》，〈史傳篇〉。
14. 劉知幾：《史通》，〈六家〉，〈二體〉。
15. 《漢書》，卷六十二，〈司馬遷傳〉贊。
16. 《後漢書》，卷四十，〈班彪班固列傳〉。
17. 《資治通鑑》，卷一，〈周威烈王，「三家分晉」〉條之「臣光曰」全文。
18. 《資治通鑑》，卷六十九，論正統之「臣光曰」一段文字。

14 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

- 19.《資治通鑑》，卷一九六，〈公元 642 年，夏，四月〉條。
- 20.《資治通鑑》，卷二四六，〈公元 839 年，冬，十月〉條。
- 21.朱熹：〈古史餘論〉，收入：《朱文公全集》，（四部叢刊初編縮本）（七），卷七十二，頁 1334，上~1338，上。
- 22.朱熹：《御批資治通鑑綱目》，（四庫全書珍本六集之第 133 - 172 冊），〈朱子序例〉，〈凡例〉。
- 23.《資治通鑑》，卷二九四，〈進書表〉。
- 24.呂祖謙：《東萊博議》，第一篇，初編縮本。
- 25.王夫之：《讀通鑑論》，卷末，〈敘論〉。
- 26.《呂東萊先生文集》（金華叢書本），卷十九，〈史說〉。
- 27.黃俊傑：〈朱子對中國歷史的解釋〉，《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》（下）（台北：中研院文哲所，1993 年），頁 1083 - 1114。
- 28.鄭樵：《通志》，〈總序〉。
- 29.馬端臨：《文獻通考》，〈自序〉。
- 30.黃宗羲：《明夷待訪錄》，之〈原君〉，〈原臣〉，〈原法〉，〈置相〉各篇。

參、參考讀物：

- 1.馬一浮：〈復性書院開講日示諸生〉。
- 2.馬一浮：〈讀書法〉，皆收入：《復性書院講錄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 年）。

- 3.熊十力：〈怎樣讀馬一浮先生的書〉，收入：《爾雅臺答問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3年）。
- 4.王陽明：〈尊經閣記〉，收入：《古文觀止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71年）。
- 5.錢穆：《中國史學名著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83年）。
- 6.錢穆：〈孔子與春秋〉，收入：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71年）。
- 7.錢穆：〈經學與史學〉，收入：杜維運、黃進興合編，《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》（台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76-1980年），頁120-137。
- 8.阮芝生：〈太史公怎樣搜集和處理史料〉，《書目季刊》，7卷4期，1974年3月。
- 9.阮芝生：〈試論司馬遷所說的「通古今之變」〉，《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》，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76年）。
- 10.阮芝生：〈司馬遷的心〉，《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》，23期。
- 11.阮芝生：〈論史記五體及「太史公曰」的述與作〉，《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》，第6期。
- 12.阮芝生：〈試論太史公的「究天人之際」〉，《史學評論》第6期（1973年9月）。
- 13.阮芝生：〈論史記五體的體系關連〉，同上，第7期。

16 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

14. 陳垣：《通鑑胡註表微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62年），收入：《新校資治通鑑》，第十六冊。
15. 錢穆：〈朱子之史學〉，收入：《朱子新學案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82年），第五冊。
16. 錢穆：《中國史學名著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83年），第二冊，〈司馬光資治通鑑〉〈朱子通鑑綱目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〉二篇。
17. 楊聯陞：〈官修史學的結構〉，收入：《國史探微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3年）。
18. 杜維運：《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81年）。
19. W.G.Beasley and E.G.Pulleyblank eds., *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* (London: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, 1961)，第九篇論文。
20. 貝塚茂樹：《中國の史學》（東京：中央公論社，1977）。
21. Hok-lam Chan（陳學霖），“Comprehensiveness (T'ung) and 'Change' (p'ien) in Ma Tuan-lin's Historical Thought,” in Hok-lam Chan and Wm. T. de Bary eds., *Yuan Thought: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82)。
22. 錢穆：《中國史學名著》，（二），〈鄭樵通志〉，〈馬端臨文獻通考〉，〈黃梨洲的明儒學案，全謝山的宋元學案〉三篇。

肆、思考問題：

- 1.近代中國方法意識高漲之原因何在？
- 2.何以學習歷史應該研讀史學名著？
- 3.中國史學之基本精神何在？此種精神衍發何種方法論上之傾向？試討論之。
- 4.所謂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，言簡意賅，義蘊豐富。就你目前知解所及，此語應作何解？
- 5.中國傳統學問「經」「史」合一，此一特質在史學傳統中如何表現？帶來何種結果？